



骆玉明。

受访者供图

人物简介

骆玉明,1951年7月生于上海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B站热门“up主”。兼任《辞海》编委、中国古典文学分科主编。著有《简明中国文学史》《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》《纵放悲歌——明中叶江南才子诗》《老庄哲学随谈》《诗里特别有禅》等;与章培恒共同主编《中国文学史新著》(三卷本),合著《徐文长评传》《南北朝文学》等。

骆玉明·于文学中,看见生命的珍贵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

上海瑞虹新城,楼宇林立,摩登光鲜。但在几十年前,这里还叫“虹镇老街”,是上海中心城区最大的棚户区,老上海人称之为“流氓窝”“穷街”。

骆玉明生长于此。“那是社会的谷底,社会的愤懑都会到流那里去,争吵是常见的。棚户区的家长对孩子多是放养,只要不打架闹事、不留级,就是好孩子。”骆玉明回忆,贫困的生活里也有善意。“我的母亲不识字,父亲只认识一点。家里条件不好,有人上门乞讨,母亲总会分一点米给别人。”

小学四年级,学校开珠算课了。可家里穷,张口向家人要钱买算盘实在太难了。一周一次的珠算课,他逃课,躲在教室和学校围墙之间的窄缝里。

这样尴尬又窘迫的时间如何打发?还好,有书籍。

那时候,上海有很多旧书店,书籍也在人们手里相互流转,想要找书读不是难事。“我什么书都读,《红楼梦》四年级时就已经读完了,还读了大量的翻译小说。”在拥挤的窄缝和弄堂里,他通过雨果、巴尔扎克,知道了巴黎的街道、教堂,知道了塞纳河的左岸与右岸,第一次发现世界很大。他拿微薄的零花钱租书,为了能够多读一点,尽量把租来

朋友录制了他上课的视频,切成十来分钟或二十来分钟的片段发到网上。视频里,他常常双手松松地撑在讲台上,很随意的样子。

他贴近生命的视角和风趣的讲课风格,被许多年轻人喜爱。这使他成了B站上的热门“up主”,坐拥30万粉丝。

2025年底,他来到郴州,参加老友、湘南学院教授张京华主持的“湖南悠久的历史文化”学术研讨会,谈论“潇湘八景”诗词。

骆玉明与湖南关系亲近。他是上海人,也是永

州女婿,一年中总有些时日在永州度过。夏天,他在清凌凌的湘江里游泳,“一个来回,不算费力。”在湘超比赛中,永州队好几场比赛受挫,太太急得抹泪,他笑着说与我们听,又与我立下了“下次永州见”的约定(近日,永州队最终逆袭夺冠,他立刻录制视频,夸赞永州的“骁勇少年”)。

因研讨契机,我得以采访了骆玉明。与他的谈话,像一场惬意的思想漫步。如在山水之间,有松林清源、鸢飞鱼跃,有一种审美的观照。

读书:还好有书籍

的书在一天内看完。

对于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来说,许多书籍还很艰深。但读得多了,他发现,书与书之间能相互解释,形成知识网络。

初中未读完,骆玉明下乡了。“未满18岁,体重40公斤,在崇明岛做非常重的劳动。”透过书籍,他相信历史的偏差终会结束,但尚不知道终点在哪里。“我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盲目,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不可解释的东西。”

他必须寻找心灵的逃脱。“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尽办法找到一本书,当找到的时候,会觉得我今天活过了,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情。书籍告诉我,还有一个另外的世界,生活不止于如此。”

1975年,复旦等少数高校招了一种特殊的研究班,骆玉明幸运地走入了大学。同学中,他是唯一没有上过高中的。幸而有广泛的阅读,他底子不薄。老师朱东润先生评价他:“书还是读过一点的。”

骆玉明笑称,自己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“读书人”。“读书既不是为了教课,也不是为了做学问。我读书就是为了读书,读了就行,不求甚解。”

他说,读书的乐趣在各种各样的联通与比较当中。每有发现,便快乐无比。当他讲中国山水文学是在讲述人和永恒、和宇宙之间的联系时,便联想到法国文学家卢梭将自然看作人与神之间的媒介——其实两者逻辑相通。写到老庄时,他旁征博引,提及西方的现代派小说、日本的俳句,乃至希腊语中的词汇。他引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句来解释庄子“鱼乐之辩”中的观点——“一切我所看到的都吐发出内在的意义。”

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许道明曾撰文评他:“他懂得很杂,脑中所映现的影像也特别多,所以什么地方都要伸一竿子进去。”

骆玉明对自己评价不高,自认“自由散漫”,成不了“大学者”。谈话间隙,有出版社工作人员来接洽,想为他出线装书。他挠头:“我这些破文章就没必要了。”他转头对我说:“我的同学、朋友当中有非常有成就的人,我没有什么大的成就。我就写了一点乱七八糟的东西,但对我来说,成就不重要。”

多年来,他从不同的作品里汲取不同的美,和不同的古人“交朋友”,自得其乐。

观诗:对的诗,未必是“对的人”

外出参加活动,常有些“集体行动”,或是参观,或是聚餐。骆玉明同我打趣,年纪大了有好处,可以“逃脱”一些。“以前出版社催稿,我就很努力地写。现在,我可以说我老了,写不了那么快——来拖一下稿子。”

解读古代文学作品,要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去共情古人的经验。年龄渐长,他对古人作品有新的理解。这两年,他为冯至先生的《杜甫传》作序,重读杜甫诗作。当他读到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里“霜严衣带断,指直不得结”一句,“眼泪一下子流下来了。”

当时,杜甫离长安赴奉先(陕西蒲城)探望寄居在那里的家人。天寒地冻,冷风入怀,杜甫很笨拙地打着衣带的结。但衣带断了——这肯定不是一件好衣服。这个时候,杜甫想起路上经过的骊山,那里有

行宫、温泉,有奢华的酒宴,但民间凋零而悲苦,在来的路上,他还见到了将枯的行尸。思及此处,杜甫不再管自己的衣带,写下了令人震撼的句子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。骆玉明很动情:“当你想到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差别,你才真正理解杜甫。每当他遭到残酷力量打击的时候,他总是会想到更多的人,他是一个很诚实、也很笨拙的人。我们谈情怀,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,不是生活的日常。但杜甫却把理想主义的东西当做自己的生命责任。”

骆玉明在课堂上脱口而出的话,曾成为流行一时的“金句”,在不同的网络平台流传。他谈中国诗歌里面很多女性口吻的诗歌,其实是男性写的,写她们怎么忠于男人和怎么爱男人:“我一再告诫女生,不要上文学的当。”一些网友得出结论:诗人善于伪装,诗歌是假的,诗人“人设”崩塌。

骆玉明认为,将诗人的诗句与其现实人格简单等同,是危险的。“人是复杂的。就像‘渣男’写出了深情的诗句,其实并不矛盾。我们每个人的理想状态,和现实利益冲突中的表现,本就不一样。杜甫的诗歌与人生是冲突最少的,李白的冲突就大一些。”

他是三种《中国文学史》教材的编写者,从150万字、40万字,再到10万字,面向不同专业的学生。教材的限制多,不仅要提供一种比较公众化的立场和态度,还要提供系统的知识,不能够过多发挥。但在课堂上,他的自由发挥,“比书里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。”他萌生了写一部新《中国文学史》的念头,要更多地表达自己的趣味、想法,从美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。虽然已与岳麓书社签下了意向合同,但他坦言:“到底要怎么写,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。”



安顿:在具体事物中寻得意义

那个离我们38万多公里的天体,和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?

“不知江月待何人,但见长江送流水。”骆玉明在唐诗《春江花月夜》中仰望月亮,看到的是宏大的宇宙与生命个体的关联,是每一个人生命的珍贵。他说:“江月到底在等待什么人?答案是:等待每个有意义的生命。每个人都是被这个世界等待的人。”他的解读视频,让很多人感到,自己在被那轮古老的月亮温柔地等待着、抚慰着,世界宽广而有情。网友刷了满屏的“谢谢老师”弹幕,点赞量早已突破千万。

骆玉明喜欢探究人如何在世间生存、人在环境中可能的变化问题。现代性的困境中,无意义感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,面对年轻学子们常有的“意义焦虑”,他的回答是:“要关注那些我们能够做的具体的事情。比如说你相信你爱一个人,它就是

有意义的。比如说你好好对待自己的父母、你去热爱自然,这都是好的。”

从文学入手,他谈怎么去卸下一些“包袱”:“每个生命都是外力作用的结果,没有必要把它看成是我本质的东西,比如穷并不是我的本质,它只是我的遭遇。我可以不把它背负在身上,不把它看成是我的失败。”

他确信,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富有创造力的东西,一种激发人不断向前走的因素,让人活得开心而不是憋屈,传统中的这种力量最终和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趋势是一致的。

通透、洒脱,有名士之风,很多朋友称他为“魏晋人”。他曾简单描述过,魏晋风度追求的是生命的智慧和美感。

美感,是人的生命力量的一种呈现。“但是非常完美的东西很少。”他曾在课堂上分享过一个见解:

为何苏东坡在写出《前赤壁赋》后,仍要创作《后赤壁赋》?或许正因为前者虽很“漂亮”,但都是前人讲过的东西,殊无新意,再看时,东坡未必认可,他还想追求创新。

“否定自己并不是一件坏事,是觉得自己还有希望,还在创造意义。一个不断地夸耀自己的人,已经‘死’在那个阶段了。”骆玉明说。

“种一棵不中绳墨、一无所用的大树,在无何有之乡,广漠之野,彷徨乎其下。”2025年5月,新书《书中人世:骆玉明人文随笔》出版,这句话被印在封面。它源自《庄子·逍遙游》,一棵不合绳墨而被匠人弃之不顾的大树,看似“大而无用”,却得以免遭砍伐。若将其置于虚无空旷、无边无际的原野,人便可悠然徘徊于树旁,逍遥躺卧于树下,获得精神的自由与安宁。这是庄子的精神,也是骆玉明所认可的。

对话

艺术无用,但是一种解药

湘江副刊:在信息爆炸的时代,选择过多容易让人陷入迷茫,难以明确自己的兴趣所在。您在大学里教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,现在有这样的感受吗?

骆玉明:确实。现在很多孩子喜欢那种空洞的、轻浮的状态。空虚不是来自于缺乏,而是来自于无从选择,但生活最后要迫使他做出选择。如果说对一个小孩来说,如果什么都不喜欢,可能喜欢点艺术比较好一点。有艺术就会有对美感的东西的爱好,就会不至于彻底空虚。艺术是一种解药,是一种没有目的性的存在。艺术的重要作用,是作为人对自由的希求,让人从压迫与危机中重获生命的本真力量,可以使一个空虚的生活变得有秩序。

湘江副刊:尼采有句话,艺术是我们面对存在的恐怖的唯一的途径。您怎么看?

骆玉明: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力量的主要是这三个东西:责任、成就、美感。像文天祥,他就不需要艺术,他相信他的责任,相信历史是有光芒的。

湘江副刊:相较于几十年前,我们的社会发展节奏有所放缓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年轻人该如何安顿自身?

骆玉明:生活终究会归于平淡。前几十年,中国处在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,经济高速增长的浪潮里裹挟着无数机遇与冒险。那种依托个人能力去闯荡、去博取成功的英雄主义,连同成功背后轰轰烈烈的失败,都带着极强的刺激性。

但社会终归会脱离这样的激荡状态,走向一种稳态。历史远比个体宏大,我们始终是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生存。纠结于没能身处风云激荡的“大时代”,其实并无太大意义,这本就是无从强求的事。

对有成熟判断力的人来说,这件事其实很简单:我们始终是主动应对生活,而非被动等着生活来安排我们。就像天要下雨,你该考虑的是打不打伞,而不是质问天为什么下雨——毕竟那是个比我们大得多的东西。放在当下,我们要做的也是如此,多问自己该如何应对,这才是理性的态度。可是面对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,这套逻辑就很难讲通了。他们不会想着解决问题,反而会纠结于“为什么昨天不下雨,偏偏今天下雨”,那是无解的。

湘江副刊:年轻人经常会说“很卷”,您觉得大家为什么会“卷”起来?

骆玉明:你不能跟一个无法解决衣食的人谈任何问题,首先要吃饱要穿暖。吃饱穿暖之外的“卷”,是人追求优越感。因为无法认清自我,才会通过比较确认自身价值。但实际上,人可以不借助比较实现自我确认。吃饱穿暖之后,人对生活、对他人的依赖性立刻就降低了,就可以做很多选择,有更多的生活内容。

湘江副刊:您说人类的最高理想是人类的自由得到充分的实现,但是我们生活在各种力量的制约之中。那么,如何降低外界对自身的支配呢?

骆玉明:比如不要过分追求物质生活。物质生活本身不错,但如果追求过高,必然会受别人支配。荣誉也一样,追求荣誉时,同样会被别人支配。不追求过高物质生活和荣誉,就能更容易接受自己,享有更多自由,在自由生活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乐趣。对我来说,这是最重要的。但责任也是一种选择,选择了责任,便是选择了另一种自由。

湘江副刊:实现自我确认有可依循的方法吗?

骆玉明:多读书。通过阅读,个体得以洞悉人类多元的生存样态,知晓历史长河中人类历经的苦难,从而窥见人的本质。